

珞珈史学文库
LUOJIA SHIXUE WENKU

“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成果
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资助出版

民国战争 与社会

敖文蔚 著

MINGUOZHANZHENG
YUSHEHUI



商务印书馆

“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新资料整理与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研究”成果
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资助出版

民国战争与社会

敖文蔚 著

商務印書館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战争与社会/敖文蔚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珞珈史学文库)

ISBN 978-7-100-07432-2

I. ①民… II. ①敖… III. ①中国—近代史—研究—民国 IV. ①K25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0572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民国战争与社会

敖文蔚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432-2

2011年6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8 1/2

定价: 48.00元

总 序

“珞珈史学文库”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汇集。第一批推出的是二十多位教授的文集。以后将根据情况，陆续推出新的集子。

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早在 1913 年，武汉大学的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设置历史地理部。1930 年武汉大学组建史学系，1953 年改名历史学系，2003 年组建历史学院。一批又一批著名学者，如李汉俊、李剑农、雷海宗、罗家伦、钱穆、吴其昌、徐中舒、陈祖源、周谱冲、郭斌佳、杨人梗、梁园东、方壮猷、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吴廷璆、姚薇元、彭雨新、石泉等，曾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在推动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和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繁荣的同时，在武汉大学和中国史学史上也留下了嘉名。其中，唐长孺、吴于廑两位大师贡献最为卓殊。

改革开放 30 年间，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建设成效显著。1981 年，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获得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权。1987 年，历史地理学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88 年，中国古代史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1995 年，历史系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7 年，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1999 年，建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2001 年，中国古代史再次被列为国

家重点学科。2007年，中国古代史第三次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世界史新增为国家重点学科。2008年，历史学一级学科入选湖北省重点学科。2001年，以中国古代史为核心的国家“211工程”二期建设项目“中国文明进程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启动。2008年，分别以中国古代史与世界史为中心的“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新资料整理与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研究”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中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研究”启动。目前，历史学院设有历史学、世界历史、考古学三个本科专业；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史、国际关系与中外关系史和地区国别史等12个二级学科。在研究机构方面，设有中国3至9世纪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15至18世纪世界史研究所、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研究所，以及简帛研究中心、科技考古研究中心。在前辈学者奠定的基础上，经过后继者的持续努力，逐步形成了严谨的学风和优良的教风，确立了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断代史与专门史、地区史与国别史相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并重的学术特色，成为武汉大学在海内外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之一。

历史学院的老师，在辛勤教书育人的同时，也为科学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各自从事的方向或领域，推陈出新，开拓前行，撰写了一大批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学院决定编撰教师个人的学术文集，是希望各位老师把自己散见于海内外各种出版物上的代表性论文加以整合。这样，通过一种文集，可以约略体现教师本人的研究历程和领域；而于整体方面，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展示武汉大学历史学的学科格局和学术风格。

每本文集的选篇和修订，由作者各自负责。学院教授委员会对

入选文集进行遴选，并提出一些指导性的建议。

“珞珈史学文库”的出版，得到了国家“211 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的支持，得到了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的支持，得到了商务印书馆各位领导和相关编辑先生的支持。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2010 年 2 月

目录Contents

前 言	1
-----------	---

清末民国时期的社会

清末民初社会行政管理的重大改革	9
孙中山社会思想与现代文明	22
民国时期土匪成因与治理	43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区划的演变	59
1927 年—1937 年中国保险业发展艰难之原因	75
民国时期巫术救荒初探	86

武汉抗战与若干会战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谬论特点剖析	97
武汉对日防御体系及其作用	104
南京失陷后长江流域难民西迁与救济	115
蒋介石与武汉抗战	124
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治军对策及思想	141
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战略战术思想	167
地理环境与徐州会战	196

武汉保卫战整体观	217
武汉保卫战兵略简论	225
略论武汉会战黄广战役	236
武汉会战万家岭大捷原因论析	247
武汉会战武汉撤退真相述论	259
随枣会战述论	269
略论枣宜会战	283
鄂西会战述评	297
国民政府军第六战区受降略论	313

湖北地方的抗战

清末民初湖北教育名列前茅原因论析	331
湖北抗日战争的历史作用与重要经验	350
七七事变与武汉抗日救亡运动	366
抗战时期湖北省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	377

革命根据地的社会与人物

革命根据地治理社会问题的成就与经验	391
论鄂豫皖边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	405
毛泽东设立抗日指挥根据地的两手准备	422
陶铸与鄂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430

后 记	444
-----------	-----

前 言

人们常用“北斗星”、“领头雁”和“舵手”来比喻在艰难险阻中牢牢掌握方向、引领万千民众创造奇迹的英雄。其实，学者一生中的学术研究方向也是很难把握的。经再三斟酌并确定本论文集总题的时候，先是不由得想起，我为何一直研究民国时期的战争与社会，接着，便意识到学术研究方向的抉择，也正像激流险滩上的舵手一样，要经过种种磨难及考验，方能显现英雄本色。当然，这只是平凡人论英雄而已。

由于“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政治环境的影响，我在大学和毕业留校任教的最初时期，曾接受预约在报纸上发表过批判“苏修”和林彪的小文章，这在当时并不是容易的事。因这方面的文章一般不接受个人投稿，一旦发表，既无名（不署名）又无利。1977年春夏间，为配合“十次路线斗争教育”，又受约在《武汉大学学报》上发表我的第一篇论文——《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我认为这是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在反思自己的写作时，逐渐发现了这些文章不仅政治色彩太浓，而且有的还像昙花一现没有生命力，这对我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逐步推进，学术研究也开始活

跃起来，我参加了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的《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的编撰工作，这是研究中共党史及国共战争史。当我暗自庆幸参加编写的专著即将出版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个难题：大约1981年，省里酝酿成立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与此同时，《湖北省志·大事记》中的抗日战争部分也要我参加编写。并且，省志中有较多的条目涉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及国民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抗战。这显然不是研究中共党史，我是否参加呢？在1970年的武汉大学，作为“文革”中第一届大学生的历史专业，要先开中国现代史课，再开古代史课，因为要为“现实”服务，以后各届都是如此。其实，当时中国现代史也就讲成了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那时是宣传“革命与战争”，这也很“自然”。但就在我考虑是否改变研究方向的时候，有一件事启发了我：原先合并到历史系教全校政治课（含中共党史）的老师，都受命脱离历史系，到学校直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部”去了。他们这一走意味着什么呢？我想了很久，先是认为这是教学对象、培养目标不同，后来才领悟到这是专业性质不同。于是，我毅然放弃自己很感兴趣的鄂豫皖苏区历史的研究，参加了省里组织的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并参与了《湖北省志·大事记》中抗日战争部分的编撰工作。因为，历史专业的学生应该学习较全面的中国通史（以及世界通史），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的历史即属于这种历史。学生的需求如此，老师岂能“背信弃义”？同时，由于“惯性”的作用，我对战争史的探索仍然很感兴趣，曾想扩展研究范围。在我看来，最能挖掘人类智慧潜力的是生存竞争，而兵战、商战和论战在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大大促进了人类智慧及思维方式的发展。因此，从研究国共战争到探索抗日战争，两者仍有相通之处。

其实，研究抗日战争也只是一个大的方向，我应该选择什么样

的切入点呢？这时我有一个想法：一定不要像“文革”时那样，写些缺乏理性的东西，那没有什么价值。我决定先从档案资料即第一手资料入手，希望从这些重要资源中发现好的选题。这一想法来自研究鄂豫皖苏区历史的经验。因为我们在撰写《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之前，曾以团队形式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档案馆，以及有关的许多县的中共党史研究办公室，搜集到大量的档案资料，这是我们研究的重要资料基础。后来，这本书被评为湖北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由此我深知第一手材料的重要价值。我在初步调查了解抗战时期各类资料，尤其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确定先探索抗战时期正面战场最大的会战——武汉会战，再由此扩展开来。这样，我连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并出版了专著《武汉保卫战》。这就是我研究革命和战争，尤其确定研究抗日战争的过程。现在看来，这一过程的发展有一定内在联系。

与此同时，我还研究了民国时期的民政及社会。这有两个原因：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所在的单位历史系接受了为民政部编写《民政管理发展史》这部大学教材的任务，并指定要我编写民国部分；这在当时“出书难”的年代，也是一个好机会。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我都不能推却。这一次，我根据以往的经验，首先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等处，搜集了许多民政及社会的原始材料和其他宝贵资料。就是凭着这些东西，我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另外，我在研究抗日战争时，发现战争与社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为了深化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也应探索社会。这样，我在民政及社会史的研究方面，也获得了一些成果。

这本论文集围绕民国时期的战争与社会，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6篇论文，研究清末民国时期的社会等；第二部分探索武汉抗战的军事与人物（主要为蒋介石），以及抗战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这是论文集

的主体（共16篇论文）；第三部分为湖北地方的抗战；第四部分为革命根据地的社会与人物（毛泽东和陶铸）。本论文集的30篇论文，大部分在核心期刊发表或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上转载过。

如果说，历史是关于“时间”的学问，倒不如说，它是关于过去“事实”的学问。因为，“事实”包含了“时间”，“事实”更重要。严格地讲，历史的“事实”是冷却的、凝固的、不变的，因而也是“死亡”的、不“存在”的，它应该是“昨天”的事。为了区别现实中的“事实”，我们将过去的“事实”称作“史实”。“今天”是没有“事实”的。因为“今天”发生的一切，还要变化和发展，它是“活”的，还有一个继续“存在”的过程。我们经常看到政府和研究团体主办和印发什么“工作动态”、“科技动态”、“学术动态”之类的简讯，就有这个特点。严格说来，这里面的“事实”与历史学所说的“事实”很不相同，如果我们混淆了这两种东西的界限，那就不懂得什么叫历史。历史学为什么能总结出经验和教训，为什么能研究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事实”，这就是历史学的特殊研究对象及价值之所在。脱离了这种“事实”，我们还有什么历史学呢？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对历史学的“存史、资治、教化”三大功能，才理解得比较透彻。因为“史实”是产生观点、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亦即总结经验和教训，探求各种规律的基础。“学史明智”就是这个意思。对一个史学研究者来说，知道这一点并不难，难就难在如何寻找及对待“史实”。

现在，有些研究历史的人急功近利，不愿坐档案馆，不愿与尘封的故纸堆打交道，不去下气力搜集第一手资料即“直接材料”，而热衷于第二手材料即“间接材料”，这能得到什么“史实”呢？要知道，第一手材料（原始材料）的唯一来源只能是历史事实本身，而“史实”在文字或人的头脑中存在的状况则是分散的、无形的，甚

至永无可能找到它的另一部分，因此很难获得真实而完整的“史实”。换言之，“史实”主要从第一手材料中获得。有一些人浮躁得很，还没搜集到起码的第一手资料，就想写大文章，奢谈这个“模式”，那个“模式”，其实，这大多都是从西方著作中找出一个“道道儿”，然后塞入一些材料，企图用“以论代史”或“以论带史”的办法，达到目的。殊不知，掌握基本的第一手资料，用“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的方法，才能写出有说服力的史学论文。

创新，这个具有时代气息的、出现频率颇高的关键词，经常与学术评价联系在一起。但如何创新，倒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常常使我们陷于茫茫雾海之中，不知所措。创新首先应是一种追求，这也与“史实”有关。因为史学研究，尤其作为新学科的民国史的研究，没有卧薪尝胆的精神，去搜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很难有所创新。所谓追求，与其说是一种兴趣或爱好，或者说是与职业有关，倒不如说是一种价值取向。严格地说，追求是一种人生境界，学术追求是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既然如此，学术活动也就是一种真心真意、全心全意，甚至痛苦的修炼，来不得半点的马虎和懈怠。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人把学术研究当成另外一种追求了，所谓“沽名钓誉”是也。几年前，教育部一位领导在武汉大学讲过，目前我国每年发表的社会科学类专著和论文有两万多（本或篇），但有一个缺陷：低水平重复。对此，我先是有些诧异：问题严重！紧接着，想到我自己，我像挨了一鞭子似的，心中不是滋味。虽然我一时无法判断自己的论著如何，但我觉得，“文如其人”，一个人的研究成果，反映了这个人的性格、气质、品德、素质和追求等。比较优秀的科研成果，应是“真善美”的反映，自然是一种人生追求及境界。这又与“史实”或资料有关。一个勤奋、执着和具有严谨学风的史学工作者，除了注重专业基础和理论修养，以及不断提高思维

能力和写作能力，还应在搜集第一手资料或其他重要资料上下很大的工夫。惟其如此，才可能算得上一个较全面发展并具有创新能力的人。追求是要付出代价的，愈是崇高的追求，愈要付出代价。2008年春天，一场百年未遇的大冰雪过后，我发现了一个奇迹：在我所住楼房西面的马路边，长着一丛梅树。这场冰雪前，梅花虽已盛开过一次，但因气温较高，并不怎么香。可是，在这场大冰雪中，有一次路过这里，一阵浓郁的花香迎面扑来，我感到格外奇怪。我驻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啊，“梅花香自苦寒来”！

清末民国时期的社会

清末民初社会行政管理的重大改革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在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历史则处于从古代向近代过渡的剧烈转折阶段，发生的变化广泛而深刻。但至今为止，史学界往往只重视政治、经济 and 思想文化的这一变化，而对于社会尤其社会行政管理方面的这一变化则很少论及。本文拟从这一时期产生的新的社会行政管理体系及其职能和效用等方面予以研究，以求对这一侧面所反映的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作一初步探讨。

—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凭着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大肆对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并不断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与此同时，由于清政府对外对内政策的错误，中国社会危机日趋严重。这主要表现为各种社会问题触目惊心，社会关系严重失调，以致社会动荡不安。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出现了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下层群众革命斗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另一方面亦出现了洋务运动，资产阶级领导的维新变法以及晚清最后 10 年间的